



我国的 语言文字工作 (一)

编者董原

目 录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字改革	1
汉语拼音运动	1
简化汉字运动	33
白话文运动	38
国语运动	43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改革的发展历程	48
文字改革的序幕（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	49
文字改革的高潮（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	67
文字改革在低潮中（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	92
文字改革的复兴（一九七七——一九八五年）	100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字改革

汉语拼音运动

(一) 汉语拼音的历史渊源

1. 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汉字注音。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人们为了学习汉字，曾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汉字注音。

直音法盛行于汉代，是指用一个比较容易认识的字来标注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如“盍，音古”、“毕，音必”、“畔，音叛”。这种方法简单明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利用它。但直音法有较大的局限性：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则此法不能用；有的字虽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较生僻，注了等于没有注。例如，“蹭(cēng) 糗(qiǒu)”等就没有同音字，无法用直音法注音；“然”的同音字只有“燃、蚘、髯”三个字，它们都比“然”字生僻，用其中的任何一个为“然”字注音，都难以帮助认读。后来创造了反切法，弥补了直音法的不足。

反切法流行于东汉末年，盛行于唐宋各代，是指用两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的注音方法。反切上字与所切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如“红，胡笼切”，即取“胡”字的声母“h”，取“笼”字的韵母和声调“ēng”，拼成“红”字的音“hēng”。反切法的发明，是我国汉字注音方法的一大进步。从东汉末年到一九一八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

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

然而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法是用声韵相拼的方法为汉字注音，但是却没有一套表示声韵的注音符号，而是用两个汉字来构成另一个字的音，上字只取其声，下字只取其韵，这样上字的韵和下字的声便属多余，有时声韵相拼还会受到干扰，使拼音不准。而且反切用字多而杂，有些又是生僻字，因此就削弱了反切的效能。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直音、反切注音法，都是以整个汉字的音节来注音的，没有突破汉字形体的限制，局限性很大。

2. 外国人拟制的汉语拼音。

(1) 明朝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历史上的汉字注音，除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直音、反切法外，还有西洋人拟制的汉语拼音方案。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的发展，西洋人为了学习汉语汉字，在中国传教，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曾制定过多种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的方案的外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Matteo Ricci)，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一六一五年 (明朝万历三十三年) 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内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罗常培根据文章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 26 个声母和 44 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一六二六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一六一一年来华)，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人称“利、金

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2) 鸦片战争后的教会罗马字和西洋人的汉语译音。

“利、金方案”产生后的二百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的汉语拼音也因此沉寂。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西洋人的教会罗马字和汉语译音也迅速发展起来。

A. 方言教会罗马字。

最早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年)，他于一八七年到广州传教。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

传教中心。这些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都是东南各方言地区的代表城市，这样就促使了各种方言罗马字的产生。传播得较早较广的是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一八五一年，据说仅仅在一九二一年就印售读物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对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宣传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B. 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威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 Wade）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一八六七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直到一九七七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西洋人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邮政式的方案。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写成 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 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邮政式跟威妥玛式相近。

C. 方言际辣体汉字。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合作制定了“辣体汉字”方案。这是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设想似乎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很复杂，实用价值不大。方言际辣体汉字方案的尝试是失败的。

（二）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

1.切音字运动概况。

切音字运动是指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一年的拼音字母运动。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期。当时，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于是，维新运动就成为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考虑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这样，切音字运动就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

一八九一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一八九二年卢懋章发表“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宣布了切音字运动的揭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发表过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的观点和“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来书写“中国名物”的设想，并亲自拟制过拼音方案。梁启超为沈学的《盛世元音》

写序，介绍切音字运动，赞成创制拼音文字，主张汉字和切音字并存。谭嗣同也在他的《仁学》中积极提倡拼音文字，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即拼音）的主张。

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所载，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一一年，全国各地提出的切音字个人方案有 28 种。从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几种类型：汉字笔画式 14 种，速记符号式 5 种，拉丁字母式 5 种，数码式 2 种，自造符号式 1 种，还有一个康有为的方案（未见原稿）；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 17 个是声韵双拼制，4 个音素制，1 个三拼制，6 个拼法不详；从拼写的语音看，有 10 个是拼写官话音的，9 个是拼写方言的，9 个拼音不详。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

2. 切音字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方案。

（1）切音字运动的揭幕人卢戇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

卢戇章（一八五四——一九二八年），字雪樵，福建同安县古庄乡人。他 21 岁到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语。25 岁回厦门教中国人学英语，教外国人学厦门话。他对流行于厦门的教会罗马字接触很多，教会罗马字启发了他创制拼音文字的思想。从 28 岁开始，他“屏弃外务，朝夕于斯，昼夜于斯”。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在一八九二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并手抄全文，自费刻印出版。

卢戇章认为：“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切音为字，就可以做到“字话一律”，“字画简

易”。从而，人们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国家“振兴之本”，这种观点虽有片面性，然而，这也反映了他毕生致力于切音字的研究与推广完全是出于爱国思想的指导。

卢戡章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他的这种“切音字与汉字并行”的观点是切音字运动的一个普遍观点。

卢戡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变体，他取拉丁字母“l、c、”三种笔画，加以变化，编制出一套55个字母的拼写方言（厦门、漳州、泉州等）的切音字方案。他的方案虽然是拼写方言的，但他主张语文统一，“以一腔为主脑”。认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

一八九三年，卢戡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新字初阶》，满腔热情地向群众推广，“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

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宣布“广开言路”，“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等。京官林轺存呈《上都察院书》，推荐卢戡章等的切音字方案。呈文得到各堂官会衔代奏。但是新政很快失败，“百日维新”结束，奏请用切音字的事也就无下文了。

维新运动失败后，卢戡章应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邀请，去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科。在台湾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响，放弃了变体拉丁字母的方案，设计了汉

字笔画式的方案《中国切音字母》。这个方案有声母 25 个，韵母 102 个，主要用来拼写北京音，也可以拼写泉州、漳州、厦门、福州等方言。

一九〇五年，卢戡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学部呈缴《中国切音字母》。被驳回后回厦门，在民间推行他的方案。途经上海时，把《中国切音字母》修改、补充，改名为《北京切音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六种切音字方案《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

一九一三年，卢戡章代表福建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对会议通过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见，回厦门继续推行他的方案。

一九一五年，他出版了第三个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新字》，也是汉字笔画式的。

一九二〇年，他应陈炯明的聘请，到漳州去教注音字母。这时，他不再反对注音字母，还设计了一套用于拼写厦门、漳州、泉州方言用的注音字母。

卢戡章是汉字改革运动的揭幕人，在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2) 切音字运动的主将王照和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一八五九——一九三三年)，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宁河县人，一八六七年中秀才，一八九一年中举人，一八九四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供职。他是个爱国知识分子，赞成变法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王照作为“戊戌党人”被通缉追捕，逃亡日本避难两年。

在日本期间，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制定了一个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一九〇〇年，他秘密回国，

潜居天津。这年冬天，他用“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创制官话字母的目的是想通过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唤起民众，救国图强。他认为“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至要之原”。然而，由于汉字繁难，“吾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因此他决心创制容易学习的拼音文字，立志从事普及教育工作。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就是“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全是为不识字的人兴出来的”。

《官话合声字母》是最早的汉字笔画式方案。这个方案，初稿有 49 个字母（声母），15 个喉音（韵母）；后来改为 50 个字母（声母），12 个喉音（韵母）。王照把汉语语音的 i、u、ü 三个介母，合在声母当中，这是为了便于双拼。

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新增例言”中，表达了他对切音字的几点设想：

第一，采用官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官话。因为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溥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第二，拼写白话。他声明：“此字母专拼白话”。“专拼北人俗话，肖之即不误矣。……若以拼文话则读音有混淆误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确地提出拼音文字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不适用于拼写文言的观点。

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说，“此字母虽为贫人及妇女不能读书者而设”，“然若读书人习之以

备教人，且与下等人通书信亦甚便也”。

第四，汉文和官话字母互为补充。“汉文及俗话互有长短，不特吾国旧书终古不废，以后翻译西书用汉文俗话并行，互为补助，为益更多”。他认为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汉文，更不能代替汉文，主张“勿因有捷法而轻视汉文”，而应并行并用，互为补充。

王照的方案是中国最早的汉字笔画式的官话音拼音方案。在切音字运动中，他的官话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绩。据说是“各地私相传习，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读书阅报，抒写议论，莫不欢欣鼓舞，顶礼祷祝”。

《官话合声字母》的推行，得到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天津名流、翰林院编修严修的保护下，于一九〇二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在东京出版，在中国留日学生及家属中传授。

一九〇二年，吴汝纶访问日本回国后，即大力提倡推行官话字母。他亲自派人去天津学习，然后在安徽推广。

一九〇三年，王照以“奉旨严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险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由他的学生王璞当教员，他在屏风后面倾听。同年，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奏定“学堂章程”，把“官话”列入师范和高等小学的课程。与此同时，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六人，联名上书袁世凯，要求“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凯为发展其势力，也赞成官话字母，批示“可以酌情试办”。并于一九〇四年，命保定蒙养学堂、半日学堂、驻保定各军营试教官话字母。

一九〇四年，王照为了能以公开身份推广官话字母，决定自首入狱。三个月后被释放，去保定办“拼音官话

书报社”，并在保定出版《对兵说话》官话字母书。

一九〇五年，王照回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从此，推广官话字母的义塾就发展起来，达二十四处之多，识官话字母的人达数万人。大名县知事严以盛创办“官话拼音学堂”，并上书袁世凯，要求广为设立拼音学堂。袁世凯表示同意。

官话字母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推行了十年，遍及13个省，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推行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王照是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3) 劳乃宣和他的《增订合声简字谱》。

劳乃宣(一八四三——一九二一年)，字季，号玉初，自号矩斋，晚年又号韧叟，浙江省桐乡县人，生于河北广平县外祖家。他中过举人、进士，当过五任县知事。一九〇〇年，他南归浙江，弃官从事教育，主持南洋公学和浙江大学堂。他赞成王照的官话字母，在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一九〇五年，他征得王照同意，修改补充《官话合声字母》，增加南京、苏州、福州、广州等地方言字母，制成《增订合声简字谱》。同年，他呈文请“设简字学堂于江宁省城，以方音为阶梯，以官音为归宿，奏明立案”。得到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的支持，在南京成立了“简字半日学堂”。

劳乃宣主张先学方言拼音，然后统一国语。他认为：“中国之用旧字数千年，用方言亦数千年，今欲数千年之方言，一旦变为官音，闻者咸苦其难，望而却步。……故莫若即其本音而迁就之，俾人人知简字之易学，知简字之诚可代语言，然后率而导之于国语之前途，则从之如流水，趋之如大道矣”。他的这一主张，引起一场争论。

一九〇六年，上海《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劳乃宣把官话字母增加方言，推行方言拼音，“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竭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认为“唯有强南以就北，正毋庸纷纷变更为也”。劳乃宣写信给《中外日报》，他说“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要分阶段进行，先学方言拼音字，再学官话拼音字，会加倍地快速，南方人学会方言拼音，就很容易学会官话拼音了。因此，“则不必强南以就北，自然引南以归北矣”。

劳乃宣推行“简字”，成绩也很显著，与王照南北呼应，形成了“南劳北王”的局面，成为清末切音字运动的高潮。

（4）章炳麟和他的《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音韵学家、文字学家。他参加过维新运动，后来又起来反对康有为的保皇派。一九〇三年被捕入狱，一九〇四年和蔡元培等联系，发起组织光复会。一九〇六年出狱，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本来对文字改革并不热心，但是一九〇八年的一场论战，使他成为切音字运动的支持者。当时，巴黎中国留学生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发表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汉字迟早必废，应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鼓吹废除汉语、汉文。章炳麟在《国粹学报》第41、42期上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的长文，与吴稚晖等展开论战。他并不赞成拼音文字，但是，他承认汉字“太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办法，于是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而制定了“纽文（声母）36、韵文（韵母）22”的方案。这

个方案有 15 个字母为后来的《注音字母》所采用。

(5) 朱文熊、刘孟扬等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拉丁字母式方案是第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为“五四”以后的拉丁化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第一个音素制的拉丁化拼音方案是一九〇六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它只用 26 个拉丁字母和 5 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不用其它自创的字母。朱文熊提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的观点，成为后来拉丁化拼音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最早提出“新文字”和“中国文字之改革”的概念，也是最早提出“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的人。

一九〇八年刘孟扬出版的《中国音标字书》，大胆地冲破西洋字母的使用习惯，用 b、d、g 这三个浊音字母来表示北方官话中的清音声母ㄅ、ㄆ、ㄑ。后来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以及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都继承了这一用法。《中国音标字书》是切音字运动中第一个拼写官话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6) 蔡锡勇等的速记式切音字方案。

蔡锡勇、沈学、力捷三、王炳耀等都创制过速记式汉语拼音方案，蔡锡勇仿照英文的速记，于一八九六年创造了以官话音为标准音的最早的汉语速记方案《传音快字》。他最早提出“一笔连书，可代数字”的“词儿连写”概念，他认为拼音方案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主张把古文翻译成白话，再去拼写。

沈学于一八九六年创造了速记式方案《盛世元音》。他认为“汉文处今日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从此他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全心全意

去推行他的方案。他每星期天到上海“一林春”茶楼向群众传授拼音方法，直到财产用尽，穷饿而死。

王炳耀于一八九七年创制了《拼音字谱》。他的方案虽然用速记符号，但是有拉丁字母对音，这等于还有一套拉丁字母方案，而且是一套相当系统化的拉丁字母方案。他提倡电报和旗语采用拼音，扩大拼音方案的用途。

蔡锡勇等人由于对速记符号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区别不清，因此便企图把简单的速记符号作为普及群众教育的拼音文字。

（三）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

1. 注音字母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是清末切音字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查禁了官话字母，封闭了“拼音官话书报社”，堵塞了切音字运动的主流。同年年底，王照邀合同志，纷纷上书请愿于资政院，得到切音字运动支持者的响应，当时筹备立宪的资政院接连收到六个抗议说帖，一致要求“颁行”官话简字。资政院的议员江谦以及保定、江宁、四川各地学界和京官等三百余人也向资政院请愿推行官话简字。资政院的专门小组研究以后认为：“简字足以补汉字之缺，为范正音读、拼合国语之用，亦复无疑。”并决定：（1）简字改名“音标”；（2）规定试用时期；（3）由学部审议修订一种方案，奏请钦定颁行；（4）规定用法：范正汉文读音，拼合国语。这个决议通过了，但只是一纸空文，不能实施。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的教育部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才把切音字运动的原班人马召集在一起，实现了清末资政院的“决议”精神，制定出一个注音字母方案。

注音字母运动是切音字运动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注音字母已经不是个人方案，而是在政府领导下制定的集体方案；虽然也是汉字笔画式的，但已经不是双拼制而是三拼制了。

2. 注音字母产生的经过。

(1) 读音统一会的召开。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八月七日，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十二月，教育部依此决议案，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聘吴敬恒为主任。章程规定的会议任务是：(1)“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2)“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3)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五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员代表 80 人，到会者 44 人。选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议的第一步是审定国音。为了进行审音工作，会议决定把章太炎的纽韵文加以修改，作为会上的记音字母，审音的办法是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同音字作为“备审字类”，印发给会员，由会员审定读音，用会上规定的记音字母注音。开审音会时，每省为一表决权，各省交注音单，由记音员逐一比较，以大多数为会上审定的读音。经过一个多月，共审定了 6500 多字。

审音之后，就是核定音素，采定字母，制定方案。提出的字母方案各种各样，主要有三派：(1) 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如王照、汪荣宝、江怡安、蔡璋等的方案。(2) 符号派。自定符号为字母。如卢贇章、马体乾、李良材、吴敬恒、